

盛永华 著

宋庆龄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宋 庆 龄 论

盛永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宋庆龄论

盛永华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大沙头路 2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00,000 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218-01095-4/K·249

定价 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由神户抵天津时在船上合影。

目 录

序	(1)
---------	-------

导 言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5)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	(25)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52)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111)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161)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81)
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	(225)
宋庆龄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240)
宋庆龄与青少年儿童教育	(282)
附：本书主要征引、参考书刊目录	(311)
附录一 宋庆龄生平大事年表	(313)
附录二 专著索引	(354)
后 记	(418)

序

1982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金冲及和盛永华两位同志来访。他们是为文物出版社一项任务出差到广州的（金冲及同志当时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因听说我身体不好，所以约好一出机场便直接来中大看望我。这令我十分感动。那时，盛永华同志编的《纪念宋庆龄同志》图传即将出版，所以，很自然的，如何纪念和研究宋庆龄，就成了我们三个人的主要话题。当日大家谈得很多，从孙、宋的婚姻谈到宋庆龄的革命情操和高尚品格。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不久前，盛永华同志给我来信，提起当日的情景，并告诉我她最近完成了新著《宋庆龄论》，作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的献礼。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觉得，这几十年我所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就是力所能及地为开展孙中山研究作一些呼吁。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他的思想，他的功业，是时代造就的。他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同志和战友的帮助。我多次说过，要使孙中山研究深入，必须仔细研究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还要很好地研究一批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人物。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助手和战友，在孙中山一生最后十年，她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关心孙中山，而

且在艰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在孙中山逝世后，她继续为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理想和学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此，宋庆龄无疑是对孙中山生活、思想和事业支持最大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正如盛永华同志所说的，“在宋庆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孙中山的事业与思想对她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这样，研究孙中山和研究宋庆龄，就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课题。

当然，宋庆龄本身也是一代伟人。在孙中山逝世后，她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奋斗了几十年。她对中国民主革命、对新中国的建设以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被载入史册，将永远被人民歌颂和怀念。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她的伟大人格，将千秋万代对人民发生非凡的感召力。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但像宋庆龄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时间这样长，在国内国外的地位和威望这样高的，实在不容易找出第二个人。因此，人们称宋庆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邓颖超同志在纪念文章中称她为“人中之杰，女中之杰”，“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还有同志称她“节砺冰霜，操比金石”。这些赞誉，宋庆龄都是当之无愧的。她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历史也对她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孙中山、宋庆龄这对革命伴侣，是中国历史上光芒夺目的双星。从孙中山开始寻求救国真理的19世纪80年代，到宋庆龄逝世的1981年，其间差不多有一个世纪。这一百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孙、宋两人几乎经历了这百年间中国所有最重要的历史事变，他们不仅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而且经常站在正面指导时代的潮流。他们夫妻两人的奋斗史，集中体现了中

华民族几代人的探索、奋斗和希望。我们今天要总结历史经验，振奋民族精神，就应该很好地研究孙中山和宋庆龄。对此，学术界已形成共识。孙中山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热潮；自1981年以后，研究宋庆龄的论著也不断发表，1993年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必将是宋庆龄研究新高潮的一个标志。

盛永华同志是国内较早研究宋庆龄的学者之一。在宋庆龄逝世以后，她参加筹备在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宋庆龄生平事迹展览，负责收集和考订有关文物、资料。她所编的《纪念宋庆龄同志》图传，用文物图片反映宋庆龄光辉的一生，这是国内出版的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庆龄的第一本书。此后，盛永华同志在宋庆龄研究这个领域陆续发表了一批很有新意的论文；1990年还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封充满激情呼吁加强宋庆龄研究的公开信。她本人则以更大的热情和努力进行研究，其成果就是这部《宋庆龄论》。

这几年国内出版了一些宋庆龄的传记、年谱。有关宋庆龄思想的研究，相对而言似嫌不足。盛永华同志这本新著，研究的是宋庆龄的理论与实践，着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宋庆龄思想活动的发展历程。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宋庆龄思想研究起一个促进的作用。它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宋庆龄和孙中山密切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对宋庆龄如何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着力尤深。这样，就使孙中山理论的精萃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贯通起来。于此，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孙中山、宋庆龄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不仅在他们并肩战斗的十年中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至今后的岁月，仍然是密不可分的。

我一直都为盛永华同志取得的成果而高兴。我与她在1979年认识，她那谦虚好学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我很深的印象。自1981年盛永华同志负责编辑的图录《纪念孙中山先生》出版后，我和中山大学的同事以及广东的同行，与盛永华同志合作，先后完成了好几种以孙中山以及中国近代史其他题材的图录。在工作中，大家都感到盛永华同志有较好的业务素养，同时又很乐于和善于听取合作者的意见。她主编的几种图录，都以思想性、学术性和资料性见长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她的热情、诚挚，对他人的尊重和关切，更使她在学术界结交了不少良友。近年她身体并不好，仍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完成了相当艰苦的编辑的本职工作后，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宋庆龄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

宋庆龄研究正方兴未艾，待研究的问题很多。盛永华同志有了个良好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她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陈锡祺

1992年10月于中山大学

导 言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宋庆龄和他的导师、战友、同志、伴侣——孙中山，宛如黑暗天幕中的一对‘双子星座’，给灾难深重的民众带来希望、信心和力量，使他们感受到温暖和慰藉。

“当其中的一颗巨星殒落后，另一颗星辰依然高悬天际。岁月的流逝使她更为明亮璀璨：既蕴含着已经消失的巨星的光和热，又接受了初升的太阳强力的辐射。这颗星辰照耀着民众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激励他们迎接曙光和创造新的生活。

“第二颗星辰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消失在祖国春天来临的时刻。然而，这对‘双子星座’长存于人们的心中：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抑或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进程，不仅未曾淡化他们的光辉，而且导致了更广泛的认同。”

——宋庆龄研究札记——

宋庆龄无愧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女儿，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她

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的深切理解和广泛赞颂，她属于全世界。

(一)

高耸的乔木，必然深植于沃土。不平凡的时代，孕育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杰出人物以历史为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导演了一出出社会的悲喜剧，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同时在历史进程中必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已逝的一个半世纪，堪称为峥嵘岁月，古老的中国从中世纪入于近代。但新时期帷幕的启开，既非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结果，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所导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天朝已经锈蚀的铁幕——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帝国的大门，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殖民主义一同涌入。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然而，强烈的外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使之循着独特的轨道演进，中国没有发展成为完全意义的近代化国家，却主要由西方列强塑造成为一种过渡的、畸形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帝国主义以“残酷的统治”阻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将它沦为附属国；封建主义逐渐依附于西方列强，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桎梏。因之，中国人民被套上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是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使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589页。

人民大众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为了挣破沉重的镣铐，建成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各族人民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拯救和发展中国的进程，由多个互为先导与继续的革命阶段所组成，这就是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且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段。只有循着这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梯不畏险阻地攀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才能走出苦难的深渊，进入光辉的未来。宋庆龄，正是生活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剧变的时代。她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历史的重担，进行不懈的斗争，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坚实的步伐跨越了三个上升的阶梯，并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她的思想和实践因此而具有深广的内涵，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缩影。她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她的英名世代为人们所传颂。

(二)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继承、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思想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的阶层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命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率领他们投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她的人格的魅力，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应当指出，宋庆龄的名字与孙中山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研究

宋庆龄的思想与实践，常常——不仅仅是他们并肩战斗的最初十年——离不开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正如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往往——特别是他的最后的光辉历程——也离不开宋庆龄的思想和实践。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有着主从之分，但影响是双向的。在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的征程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砥砺和促进。孙中山作为宋庆龄的导师、战友和伴侣，对她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海内外的许多忆述和著作都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阐述了这种双向的关系，美国学者谢曼（L·Sharman）在他1934年出版的《孙逸仙的生平及其意义（译传）》（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一书中，就曾指出宋庆龄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作用。而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高举他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和事业，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贯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她的努力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同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融汇起来，赋予孙中山的旗帜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现实斗争注入了更多的凝聚力。孙中山迄今仍未离开历史的舞台，仍在鼓舞人们前进，宋庆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时代与斗争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思想与相互关系逻辑发展的结果。

在评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重大的、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必须充分确认她与孙中山的关系的意义。他们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年代，跨世纪的峥嵘岁月包含了两个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而前者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两个革命阶段之间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重要的歧别。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沸腾

地、曲折地而又迅猛异常地向前奔驰发展，从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到正规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新民主革命两阶段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一次革命运动刚刚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以指导革命的新阶段。如此，便向一切站在时代的前列指导潮流的先进人物提出了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不断扬弃，及时总结并自我超越，与时俱进。任何的停顿，他们便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倒退到革命的反面。在斗争的实践中，他们必须非常注意保持革命新旧阶段的连续性——将前阶段革命的成果在下一阶段加以发展壮大，以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作为下一阶段的借鉴，而前一阶段的革命队伍，往往由那最有影响、最有威望、最有凝聚力的先进人物率领，进行整顿，投入新的革命斗争。这种承诺在很多方面都是必要的，对新阶段的斗争大有裨益。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她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感使她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跨越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先驱者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孙中山忠实的、亲密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她的奋进成为联接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了孙中山的事业。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孙中山在精神遗产以新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毋庸置疑地显示了不同革命时期和阶段的不可分割的联接和贯通性：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是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的准备；后来的、高级的革命阶段，则是先前的、初级的革命阶段的发展。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未

竟事业，为后继者们继承和推进。他的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计划，已经和正在实现。这种联接和贯通，能够使过去革命斗争的传统、经验和教训为当前革命所吸收，并使更高层次的革命斗争能够比较顺畅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在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许多仁人志士从孙中山的旗帜下出发，走进了新的革命行列，跨入了新的革命时期。

(三)

对于宋庆龄来说，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历史提供了特殊的机遇。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君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成为旧中国的痼疾。认真观察和了解世界，向西方寻求借鉴，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冲决封建主义罗网，使中国入于近代，是时代对中国人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成长的必备条件。宋庆龄的特殊的家庭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使她得以在少年时代就飘洋过海，走向广阔的世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是使她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洗礼。这种思想和政治的洗礼，不仅对于民主主义者是必须的，同时是他们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重要的积极因素。还在负笈异域的少女时期，宋庆龄就憎恶中世纪的观念和事物，认为清帝国的统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切望祖国挣脱桎梏而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强烈的爱国主义成为这位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留学生的思想的主流。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所有先进人士救亡图存的热望。因之，爱国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当时进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还在宋庆龄的童年时代，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掠，中

国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她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为祖国遭受到瓜分、共管的厄运而悲愤。她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能忍受在学校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有悖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为中国曾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当前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正在“唤醒中国人民的觉醒”。她确信只要“唤起全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有“真正的进步”。

旧中国专制制度的朽败和野蛮，民众的贫困和无权，使她在痛苦中思索，并使她萌生了社会变革的热望，要求更新和进步。她亟望人民摆脱“奴役”，获得“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为此，她坚信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消灭“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的罪恶统治，使得中国从“贫困不堪”变为“繁荣昌盛”。

她满怀爱国激情和变革热望进入了青年时期。迎接她的是剧变的中国和世界。

辛亥革命有如昙花一现，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斗争的果实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攫夺。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民国徒具虚名。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他的少数战友，包括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再次流亡日本，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中策划新的斗争，以捍卫共和制度。宋庆龄未能从大洋彼岸回到离别五载的祖国，辛亥革命——她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没有如她所期望那样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生机和活力，学成归国后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更无由施展。宋庆龄于1913年夏从美国迳直去到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学生和战

友。年青的文学士在投身革命时，即刻“接近了革命的中心”。而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友谊，则是机缘：当宋庆龄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通过她的父亲的关系，这位献身崇高事业的巨人就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其后艰苦的斗争中，他们结成为生死不渝的伴侣。

在后来的十年里，宋庆龄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砺。为了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维护共和制度，她与孙中山曾经流亡异国、开府广州和寓居沪滨租界，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但是，终于回天乏术。逆转的形势无可挽回，是由于旧民主主义已经濒于尾声，难以再涌高潮。而宋庆龄却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饱经挫折，在孙中山的教导下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并积极地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

历史进程中的停滞和逆转总是暂时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期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到来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革命的新阶段对宋庆龄和孙中山是严峻的考验，却使他们看到了“大希望”。他们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着继续领导和推进革命，他们自觉地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检验过去的理论与实践，使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适合“世界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通过了探索和扬弃，孙中山的晚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对于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展，宋庆龄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由于她承担了大部分实际的